

难以言说的创伤之痛

——《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的家庭关系

○盛春来 朱宾忠

摘 要: 石黑一雄擅长描写记忆和战争创伤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作家描绘战争参与者的创伤症候,他在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从非战争直接参与者的视角更深刻揭示了战争的巨大灾难,在看似平静的追述中深入刻画了战争创伤和急速变化的时代导致家园残破、亲属关系失和及成人和孩子倒置的代际关系;在二战后重建的激烈浪潮中,主人公重拾信心,并在不同程度上重建了家庭关系。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独特地运用了回避叙事和言说他者故事来投射受创者内心创伤的写作技巧,这不仅确立了他本人的文学地位,也体现了他反思战争,关注创伤受害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 《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创伤;家庭关系

作者简介: 盛春来,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三峡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E-mail: Colinsheng@126.com);朱宾忠,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19)06-0112-07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19.06.011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的创伤研究方兴未艾,不同于别的作家直接描述战争参与者的创伤症候,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从非战争直接参与者的角度叙写战争创伤侵入家庭,在追述人类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反思战争的巨大伤害。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及其姊妹篇《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的背景都设置在二战后的日本,叙述战争和战后重建对人们的影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是直接参加战争的幸存者,而分别是家庭妇女和浮世绘画家,从这些非战争直接参与者的角度刻画战争创伤的力度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其对普罗大众的影响而更加深刻。《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挖掘由于战争和核爆引发的创伤,刻画了战后还来不及医治创伤的人们又卷入了战后重建的激烈浪潮中的复杂心态。两部小说的核心是创伤的影响:没有别的地方比在孩子身上和在家庭关系中体现得更明显,孩子们身上栖居着成人的思想,相反,成人表面上或道德上已失去了他们应有的举止,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愿面对过去和陷入对往事的悔恨之中,并且他们表现出孩子性的一面以便逃避责任,成人和孩子失和、倒置的代际关系透析出创伤侵入家庭的病态投射之像。

国内外以往的研究多专注于这两部作品的“日本性(Japaneseness)”和不可靠叙事研究。加芙列莱·安南(Gabriele Annan)认为这两部作品都是“日本性的解释、甚至是控诉”^①,中国学

收稿日期:2018-12-10

^① Wai-Chew Sim. Kazuo Ishiguro, Routledge, 2010, p. 113.

者赖艳^①也认可其中的日本性想象；张宇金（Yugin Teo）^②和国内学者汪筱玲^③等从记忆和叙事策略探讨作者的写作手法，梅丽也从多样性投射和偏离性叙述来论述石黑一雄作品的历史创伤，^④但鲜有人论述这两部小说中创伤阴影下的家庭关系。所以笔者关注创伤侵入家庭，导致家庭残破、家庭气氛压抑、亲属关系失和及成人和孩子的关系倒置。“石黑一雄的作品在朴实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下隐藏着过于猛烈而不能直接面对的伤痛，伤痛的揭示不是通过事件直接呈现，而是通过间接、掩饰、沉默、压抑和变形展示，在这种视角下，事物首先显得模糊和歪曲。”^⑤需要看到的是：作者对这些违和的场景不是直抒胸臆地揭示，而是比较隐晦地通过他人之口来叙述自己的遭遇或以回避叙事的策略来呈现，这既是回避创伤症候的本真反应，也是治愈创伤的途径。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写作角度和写作方法的创新不仅确立了他本人的文学地位，也体现了他反思战争，关注创伤受害者的悲悯情怀。

一 侵入家庭的创伤之痛

现代创伤研究随着二战回忆录、大屠杀记忆、集中营迫害和恐怖袭击等相关资料的问世而受到广泛关注，著名的创伤研究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是突然的或灾难性的压倒一切的体验，人们对此反应通常是延宕的，无法控制性地重复出现幻觉或其他现象的侵入。”^⑥创伤的症候具有滞后性和不可控制性，并且会以噩梦、闪回等方式重复出现，导致受创者产生分裂的情感体验，见证创伤的受创者还会产生压抑感和负疚感。创伤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战争导致的创伤无疑是最明显、伤害最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DST）的应激源可能是危及生命的灾难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的精神或身体上的伤害，也可能是微小而长期积累的家庭内部矛盾引起的创伤，创伤会导致受创者自我压抑，远离社群，甚至是性格改变和自我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和久久难以抚平的创伤记忆。美国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的战争伤害震慑了日本和世界，满目疮痍的末日图景成了日本人心中难以忘记的创伤记忆。“幸存者无法从梦魇中解脱出来，许多人始终受到负疚心理的缠绕^⑦，核爆促使日本投降，日本一下子从战前的侵略国变成了投降国、任人宰割的战败国，日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降到了冰点，巨大的心理落差不仅在上层社会引起震动，也在普罗大众身上产生了难以平复的影响。在《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尽管战争和原子弹爆炸的创伤事件作为前叙事并未直接进入到故事的叙述中来，但它们的影响仍是无处不在，而且创伤的延宕性症候对故事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诸如爆炸或投降本身就是痛苦的，但它们还纠缠着令人可耻的必胜信念和军国主义者的想法。”^⑧所以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原子弹爆炸的创伤记忆、战败的羞辱感都成了小说主人公们不得不直面的伤痛。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至亲要么直接死于战争，要么死于战争导致的创伤，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死亡都给家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

① 赖艳 《石黑一雄早期小说中的日本想象》，《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82—87页。

② Teo, Yugin.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③ 汪筱玲、梁虹 《论石黑一雄小说的双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75—180页。

④ 梅丽 《论石黑一雄的历史创伤书写》，《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97—202页。

⑤ Wright, Timothy. No Homelike Place: The Lesson of History in Kazuo Ishiguro's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4, (1), pp. 58—88.

⑥ 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⑦ [美] 约翰·赫西 《广岛》，董幼学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⑧ Eckert, Ken. *Evasion and the Unsaid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Johns Hopkins UP. 2012, (1), pp. 77—92.

《远山淡影》的叙述者悦子是一位家庭残破,饱受创伤侵袭的日本中年女性。她是战争的孤儿,也是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悦子在战后移居英国,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也决定了来自战败的、法西斯日本的她在战争胜利方——英国必须夹着尾巴生活,所以她隐忍的性格特征既有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带有原子弹爆炸的创伤和日本战败导致国民情绪低落的印迹。悦子的化身——佐知子年幼的女儿万里子(景子)目睹了一个痛苦不堪的、在战争中受创的女性在沟渠里淹死自己婴儿的场景。溺婴事件给万里子(景子)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记忆,在日后的生活里,万里子(景子)总是臆想地和那个溺婴女性在一起,少女时期目睹溺婴事件和几乎被母亲遗弃的创伤经历滞后地在成年时期体现出来,导致了她的性格改变和自我伤害。巴利·路易斯(Barry Lewis)还认为随母移居英国的景子(万里子)经历了“地理错位,认知错位,心理错位和家庭错位”^①这些错位更加深了景子(万里子)的创伤。叠加的创伤经历嵌入她的记忆,破坏了她基本的人际关系,导致受创者远离人群、自我孤立,并且随母移居英国的景子(万里子)还要忍受文化断层以及与主流文化疏离的文化创伤的影响。遭受创伤影响的景子(万里子)离开了熟悉的家乡,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自我生活在完全隔离的陌生世界里,所以缺乏安全感和家庭关爱的景子(万里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消极逃避心理创伤,吃饭由母亲把碗放在房间门口,拒绝和家人交流,受创的她隔断与亲人和社群的联系,自我隔离,陷于和外界脱离联系的、自我孤立的受创症候,终至自缢而亡。

《远山淡影》的姊妹篇《浮世画家》里,主人公小野成为画家的梦想在小时候曾遭到无情的反对,小野的父亲烧毁小野所有的画作给他留下了沉重的心理创伤;成年后小野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他的妻子死于战争的空袭,儿子死于中国战场。小野童年时父亲留下的创伤,成年后的战争、核爆和战败的创伤阴影破坏了他正常的人际交往。在家庭里,女儿和女婿对他充满怨恨;在外面,邻居和朋友诟病他战前的事迹;和他在战前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三宅公司的总裁和作曲家都自杀谢罪,就连小外孙都担心四面悲歌的小野也会自杀。“整个世界似乎都走火入魔了。每天都有报道说又有人谢罪自杀。”^②战前彬彬有礼的女婿池田也因为战争变成了情绪经常失控的人,池田不断拷问发动战争的责任,女婿含沙射影的诘问使得自知理亏的小野饱受创伤之痛。作为法西斯日本的遗老,战后小野因为曾为军方服务而不得不从画界隐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嫁掉小女儿仙子,嫁掉仙子的过程就是他不断反省,努力和过去的“我”决裂的过程,也是他重新树立家族形象,修复创伤、重塑自我身份的过程。

创伤侵入家庭不仅使得家庭成员饱受创伤之痛,亲属关系异化,就连作为战争和核爆最明显遗存的房屋也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伤痛,两部小说的开头就描述了主人公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远山淡影》里佐知子的家就是“乡下常见的那种木屋子,斜斜的瓦屋顶都快碰到地面了”^③。这座孤零零的小木屋幸免于战火,破旧的小木屋暗喻了居住者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里风雨飘摇的生存境遇,也表明了残破的家难以给历经创伤的居住者提供庇护。同时,河边的乡下小木屋“地理位置上的偏僻揭示的是背后的权力关系”^④,暗示了战争受创者远离城市中心,难以短期内重建家园的困境。《浮世画家》的开头就讲述了在战前小野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宽阔大宅也在战争中严重破坏,“那时我已经把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修好了,但阳台的一端仍然高低不平,满

① Lewis, Barry. contemporary writers: Kazuo Ishiguro,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

② [英]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67—688页。

③ [英]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④ 黎林《隔离、边缘与重塑:女性主义地理学视域下〈晚安,妈妈〉之主题再探》,《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28页。

是裂缝，因为当年的炸弹把地板都掀了起来。”^① 作为精神家园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全家起居、生活的房子是这样破败，环境如此恶劣，那生活在其中的家人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由于日本战后初期经济崩溃，生活极端贫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本该给家人带来温暖和慰藉的房子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家不再是安居的场所，家庭已经失去了对家庭成员的保护和抚养功能。两部小说中战争引发的难以直面的心理创伤和家园毁坏的结构性创伤都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充满压抑而失和的创伤生活。

二 创伤下失和的家庭关系和倒置的代际关系

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认为“创伤事件侵犯一个人基本的人身权利的自我管理，创伤事件摧毁一个人在和他人相处时自我认知的信念。”^② 由于创伤记忆潜伏在潜意识里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所以有过创伤经历的人更容易给别人造成伤害，当一个家庭成员有了创伤经历的时候，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创伤的困局，导致家庭关系失和。家庭关系失和在《远山淡影》里突出体现在母女关系上。“在一个家庭中，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孩子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万里子的母亲佐知子遭受过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创伤，丈夫的死亡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剧，战争未亡人佐知子在遭受战争的创伤后渴望逃离日本，她千方百计交上了美国男友，不仅遭到邻居的白眼，还被美国男友欺骗，再次遭受创伤的她避免任何情感的介入，拒绝被帮助，隔断和过去的联系。美满的家庭是儿童幸福的源泉，而残缺的家庭则容易导致儿童心理创伤，佐知子不仅难以排遣自己的创伤，更忽视女儿万里子的变化，佐知子也不愿意为万里子的学习和生活付出更多，她总是把万里子单独扔在黑暗的小屋里，放任年幼的万里子离家出走。佐知子不仅淹死了女儿唯一心爱的小猫，更是埋葬了和女儿和解的可能，使得万里子再一次直面了创伤的伤痛，本该是快乐的郊游反而折射出万里子和佐知子紧张的母女关系。所以有论者认为，佐知子母女的关系“说简单一点是失职，说得严重一些就是谋杀。”^④ 佐知子也没有履行一位母亲对孩子应有的照顾和教育的责任，失职的母亲放任孩子的成长，破碎的家庭关系给年幼的万里子（景子）埋下深深的创伤印记。“爱的客体的缺少和外在世界的诡异变异会产生内并心理创伤。在心力投入过程中，内并形成无法逾越的障碍，给自我造成无法承受的痛苦现实”^⑤。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的万里子（景子）又得不到母爱的温暖，被剥夺了直面自我和世界的力量，所以她选择了自缢。

日本的战后重建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化，不仅旧的思想遭到质疑，而且新式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快速侵入家庭生活，引起了代际之间在观念和思维等方面的冲突，导致家庭矛盾。“代际之间在面对提供保护与指导，在生活凄惨的过去和新的充满机会与不安定的美式民主生活之间充满了矛盾。”^⑥ 如果说《远山淡影》里失和的家庭关系是创伤侵入家庭的直接影响，那么《浮世画家》中倒置的代际关系既是由于代际之间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价值观的冲突，也是创伤受创者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其目的是帮助自我应对创伤的伤痛记忆和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的需要。

倒置的家庭关系在《浮世画家》里首先体现为父权制的让位：在家庭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① [英]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第67页。

②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224.

③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2, p. 118.

④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 18.

⑤ 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125页。

⑥ King, Bru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 116.

的不是父亲小野,而是两个女儿,特别是大女儿节子,她一再催促父亲为了妹妹的婚事早日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以小野不得不频繁拜访先前的故旧,劝说他们替他掩饰战前的“劣迹”以通过女婿的考察。传统的日本家庭和中国一样也是父权和男权至上,“在以男子优先、父子关系为本位的家庭转变为以男女平等为前提、以夫妇关系为本位的家庭的过程中,妇女的地位普遍得到提高”^①。战后日本在美国扶持下开展了民主化进程,女性获得了选票权,妇女地位也大大改进,家庭关系的转变使得女儿能在家庭里支配父亲,这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女性如小野的母亲总是唯唯诺诺,未经允许也不能随意进出客厅,所以成年后的小野在战前也是不允许女儿们进入象征家庭中心的客厅。战后传统的父权制被打破,女性走到生活的中心,分享家庭权力,介入社会活动。妻子拒绝把票投给丈夫支持的政党,美国人的到来粉碎了日本先前传统的教育、家庭和社会体系。战后美国占领状况下的西式思想和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传统,并导致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父权地位的弱化,尽管这是时代的进步,但这种快速变化引起的男女、父权地位的“倒置”在还未摆脱传统影响的战后日本难以接受。

其次,倒置的家庭关系还体现为小野思想上的“幼稚”和外孙一郎想法上显得“成熟”。这种倒置的代际关系实则折射出两代人在新的时代面前不同的应对态度。年老的一辈如小野力图维持旧的思想体系,而年轻人包括孩子们热烈拥抱新的价值体系。在小野看来,“吸引年轻夫妇大多数新建的公寓楼,在我看来缺乏想象力,很压抑……不过,仙子似乎对她的公寓感到很得意,嘴里不停地赞扬它的现代特征……全是按照西方风格设计的。”^②“剧烈的社会变迁形成了不同的‘精神时代’,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因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而具有不同的精神和意识结构”^③,不同的精神时代和意识结构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在小野为女儿的婚事忙碌之中,仙子不理解父亲的工作,甚至对小野修剪花朵也大加指责,“那么,爸爸一定是眼睛瞎了。或者,就是品味太差”^④。在成年人身上不被认可的小野,只有在和小外孙一郎的相处中才感到快乐。就连仙子也把父亲和一郎混淆,她分不清到底是小野还是一郎要看恐怖电影,仙子模糊了小野和一郎的界限。小野通过孩子的视角透析出自己不得不面对社会审判的尴尬处境,小野表现出孩子气,乃是从成人世界退回到孩童世界、意在重新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从精神上逃离痛苦不堪的过往,所以他和外孙一郎表现亲密,而一郎意外地显得善于思考、很有理性,他表现了一个孩子少有的成熟和理性。小野和一郎的关系倒置,表现成熟的是外孙一郎,显得孩子气的则是外公小野,小野退回孩童时期则是“恢复以前的自我丧失的过程,也是哀悼失去自我的方式”^⑤。沃克韦兹(Walkowitz)认为“石黑一雄要读者像小野一样明白,曾经正确的已经改变:小野要和过去分离,展示过去,质疑过去,远离专制主义,目的是在当下能负责任地生活。”^⑥小野先前的生活被认为是畸形的、充满罪恶感,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必须赎罪。当他回忆往事,他发现记忆已经染上了否定和遗忘的光晕,年轻和年长时的自我的界限已经模糊,并且在和孩子们的交往中,代际矛盾开始显露。小野挣扎着扩大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为了给他新的境遇提供栖身之所,他看似漫无边际的叙事方式乃是重新界定自己的努力,这样也使他建立了秩序和获得了连续认知的意识,还为他检验不同的主体身份提供了可能。

① 张健、王金林《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

② [英]石黑一雄《浮世画家》,第195、133页。

③ 廖小平《代际伦理——一个新的伦理维度》,《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46页。

④ [英]石黑一雄《浮世画家》,第195、133页。

⑤ Sebastian Groes and Barry Lewis, Kazuo Ishiguro: New Critical Visions of the Nove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90.

⑥ Walkowitz, Rebecca L. Cosmopolitan Style: Modernism Beyond the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6, p. 1289.

还要看到，大人和孩子代际之间的矛盾正是战后全球政治的缩影：新的、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势力主导了战后日本的去军事化和社会重建运动，美国如“父亲”般保护日本，日本也就沦为了被保护、被改造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扮演引起了两代人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两部作品中的孩童并不无知、单纯，他们都是成人创伤行为的病态投射，孩子的行为表现得像成人，而成人为了逃避责任表现得像孩子。《远山淡影》里的万里子和《浮世画家》中的一郎都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成人堕落，孩子单纯的意象。他们都是创伤回溯和由成人构建的自我防御机制的投射，相反，成人如佐知子和小野无意识地退回到孩子阶段来逃避创伤和重构自我。

三 修复难以言说的家庭创伤

凯西·卡鲁斯认为创伤的症候会在创伤潜伏期以延迟的形式出现，这就决定了创伤之后，受创者会陷入连续的情感压抑和创伤回归的状况。弗洛伊德认为在意识限制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压抑就产生了。^①如果把主人公悦子和小野先前的创伤经历比作成潜意识的话，那么他们叙述故事的时候就是处于意识的阶段。“在创伤事件之后，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负罪感与低人一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②。小野和悦子在追述往事时显露出来的负罪感就是他们创伤症候的表征，他们采取有意识地压抑、回避的叙述方式来压制创伤的记忆，由于他们的创伤症候都集中体现在家庭矛盾中，家庭创伤带有私密性和滞后性，因而创伤难以言说。两部小说中的悦子和小野都回避叙述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创伤记忆，都采用了不直接叙述的回避策略表征难以言说的创伤症候，但创伤的记忆还是迂回地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从而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石黑一雄在这两部小说中没有止步于仅仅刻画战争的创伤，而是进一步叙写了主人公自我反省和建立与外部的联系，最终修复创伤、重建家庭关系的痛苦历程。创伤修复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安全感，第二阶段是回忆与哀悼，第三阶段是恢复与正常生活的再度联系”^③，“而安全感的重建是通过共情、群体联系以及恢复信心的途径实现的”^④。“建立与外部的关系是创伤修复的基础，创伤叙述是创伤修复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幸存者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⑤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生活虽有波澜，但总体安全、稳定，他们通过回避叙事哀悼创伤的经历，在叙事中外化创伤经历。叙事的过程也能帮助受创者重新审视和评估创伤事件，帮助受创者缓解并修复创伤，因此他们能顺利度过创伤修复的前两个阶段。在创伤修复的第三阶段，悦子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投射在她人身上来减轻创伤自我的负罪感，并通过和小女儿交心的谈话使自己逐渐重建家庭关系；小野通过自我反省和嫁女过程中与其他人的联系治愈了创伤，重建了家庭关系，因此小野和悦子都走出了创伤，重建了创伤的家庭关系。

悦子重建家庭至少经历了两次，第一次在和日本丈夫一郎离婚后，日本社会浓烈的重建氛围激发了悦子（佐知子）重建家庭的信心，即使是因为战争失去丈夫和四个孩子的藤原太太也重新焕发出生活的信心，深受鼓舞的悦子也决心要“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庭了……我们俩真的都应该心存感激。我们也许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但是还有那么多盼头。”^⑥悦子（佐知子）决心要

① Freud, Sigmund. Repressio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957, (16), p. 15.

② [美] 朱迪思·赫尔曼 《创伤与复原》，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③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246.

④ 曾艳钰 《后“9.11”美国小说创伤叙事的功能及政治指向》，《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第58页。

⑤ 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

⑥ [英]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第140—141页。

离开充满痛苦记忆的日本,但她把重建家庭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兵弗兰克身上,嗜酒成性、玩弄女性的弗兰克成了她逃离日本的救命稻草,小说虽没有交代佐知子是否去了美国,但后来的叙述暗示了悦子第一次重建家庭并不成功。逃离到英国后,悦子第二次重建了家庭,并生有混血小女儿,但很快她就遭到一连串打击。英国丈夫不久离世使她失去了依靠,特别是长女的死亡更是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悔恨,唯一能带给她慰藉的小女儿妮基也和母亲貌合神离,悦子通过回忆和哀悼把自身的痛苦通过他人来言说,以此来缓解和修复创伤。在妮基看望悦子的几天时间里,连绵的细雨使整个回忆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尽管妮基和悦子关系疏远,相处并不融洽,但在妮基离开的最后一天,连日多雨、有雾的天气居然放晴,并伴有鸟鸣之声,暗示了母女之间冰释前嫌,重建温馨家庭关系的可能。在《远山淡影》结尾处,站在门口送别妮基的悦子关上门就是隔断痛苦的过去,打开门就是迎接新生的开始。石黑一雄以悦子本人而不是化身佐知子来结束故事,显示了悦子历经伤痛后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不需假借别人讲述故事求得安慰,这也不啻是修复创伤、重建家庭关系的一种迹象。

不仅悦子专注于家庭,《浮世画家》中的小野也在战后回归家庭,他从战前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画家变成了遭人唾弃的战争帮凶,不被社会接纳的小野只有躲在家里舔舐伤口。家庭是遭受战争创伤和受到社会批判的小野的避风港,小野也强烈地感觉到“只有孩子的事确实让人操心。”^①回归家庭的他不但和外孙一郎相处融洽,还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操办小女儿的婚事当中,在小野的不停奔波之下,小女儿仙子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婚姻,大女儿不失时机地和父亲的和解也使得小野的家庭关系最终实现重建。获得新生的小野发出由衷的喜悦“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喜悦,坚信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公正的承认。我付出的艰辛,我战胜的疑虑,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②在小说结尾处,包括家庭关系和社会重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让小野看到了希望“看来,我们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③作者也借小野之口抒发了只有真诚地反省不光彩的历史,才能获得内心喜悦的情感。毫无疑问,悦子和小野重建家庭关系正是战后日本重建家园的缩影,两位非战争直接参与者战后修复创伤,重建家庭关系的艰辛之路,体现了作者反思战争创伤的悲悯情怀。

《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从人类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入手,以战争创伤侵入非战争直接参与者的家庭创伤记忆为主线,杂糅了战争和日本战败带给国民耻辱感的伤痛经历,创伤的过去不堪回首,但过去总是迂回地进入到现在,并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经历创伤的一代人还来不及舔舐以前的伤口就又卷入了战后重建的激烈浪潮中,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也加剧了代际之间的矛盾,于是成人坚守传统价值暂时掩盖了社会急速变化引起的不适,他们压制自己和表现得像孩子般来实现精神上的逃离和悔改,受创者压抑难以言说的内心伤痛,通过回避叙事和言说他者创伤的故事来投射内心的创伤。好在他们最终能自我反省,重建家庭关系,获得了重新面对新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这既是成功修复创伤的表征,也从更高的层面上指出了正确看待战争创伤的态度。

(下转第128页)

① [英] 石黑一雄 《浮世画家》,第120、255、258页。

② [英] 石黑一雄 《浮世画家》,第120、255、258页。

③ [英] 石黑一雄 《浮世画家》,第120、255、258页。

Haizi's Absurd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JIAN Wei-jie , XIE Yong-xin

Abstract: Haizi is a poet with existential consciousness , his view of existential poetic spirit reflected in consciousness of shock and transcending consciousness , and the absurd understanding of existence. Starting from the absurdity meaning and reason of Haizi's poetry tex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ence absurdity and repetition absurdity revealed in Haizi's works , as well as Haizi's concept of existence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appiness shielding and suffering , and then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Haizi's internal experience as a living artist , and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artist and existence by Haizi's absurdity poetics concept.

Keywords: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Haizi's poetry; absurd poetics

【责任编辑 陈 雷】

(上接第 118 页)

Unspeakable Traumatic Pain: Family Relationship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SHENG Chun-lai , ZHU Bin-zhong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other writers who describe the traumatic symptoms of war participants , Kazuo Ishiguro is good at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war trauma. In his novels of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 he deeply revealed the great disaster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direct participants. In the seemingly calm recounting , he deeply described the era of war trauma and rapid change , which had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 the loss of kinship , and the inverte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the fierce wave of reconstruction after World War II , the main characters regained their confidence and rebuilt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se two novels , the author uses the writing skills of avoiding narration and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other to project the inner trauma of the wounded , which not only establishes his literary status , but also reflects his reflection on the war and his concern for the compass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trauma.

Keywords: *A Pale View of Hills*;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trauma; family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龚桂明 陈西玲】